

第十一册

望堂金石

楊守敬集

主編

謝承仁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湖北教育出版社

楊守敬集

一



◎

謝承仁 主編

第十一冊

湖北人民出版社
湖北教育出版社

楊守敬集編輯委員會

主編

謝承仁

編委

于 洸 王永瑞

邱久欽 李楚興

林培黎 鄒志群

陳金安 陳建堂

馮方華 婁齊貴

楊中岳 楊傳緯

齊世榮 蔡學儉

劉鼎華 盧福咸

(以上按姓氏筆畫爲序)

項目責任編輯

李爾鋼

祝祚欽

李作君

胡治洪

本冊責任編輯

王建槐

封面設計

汪 漢

技術設計

萬超彬

杜義平

余兆偉

本冊責任校對

和曉玲

望
堂
金
石

郝志羣
賈雙喜
冀亞平
整理



目次

前言……………〔七〕

《望堂金石》序……………〔十五〕

望堂金石初集……………〔十七〕

無朝代古碑

1 石鼓文

2 壇山刻石

秦

3 琅邪臺刻石

4 泰山刻石

漢

5 西嶽華山廟碑

6 淳于長夏承碑

7 冀州刺史王純碑

- 8 冀州從事張表碑
9 陳德殘碑
10 元儒先生婁壽碑
11 熹平石經殘字
12 酸棗令劉熊殘碑
13 司徒殘碑
14 戚伯著碑
15 破張郃銘
16 中牟魯君闕
17 卜君頌
18 廣平侯闕
19 司農公碑額
20 征西大將軍楊瑾殘碑
21 大將軍曹真碑
22 天璽紀功碑
23 許長史舊館壇碑

隋

- 24 丁道護啓法寺碑

唐

- 25 孔子廟堂碑

- 26 化度寺邕禪師碑

- 27 九成宮醴泉銘

- 28 虞恭公溫彥博碑

- 29 附日本題名殘碑

- 30 郎官石記序

- 31 慧山寺石牀題字

- 32 麻姑仙壇記

望堂金石二集

漢

- 33 韓勅脩禮器碑

- 34 東海廟殘碑

前秦

- 35 廣武將軍碑

北魏

- 36 鄭文公碑

37 崔敬邕墓志

隋

38 丁道護啓法寺碑

39 姚恭公墓志

唐

40 孟法師碑

41 王宏範碑

42 道因法師碑

43 懷仁聖教序

44 李秀碑

45 法華寺碑

46 李思訓碑

47 附日本佛足跡碑

48 附日本道澄寺鐘銘

49 附日本銅燈臺銘

50 附高麗真鑒禪師碑

《望堂金石》跋……………

〔五〇一〕

前言

《望堂金石》是楊守敬繼《評碑記》、《評帖記》之後編著的第三部金石著作，又是他所彙行的金石著作中最早的一部。書中精選周、秦、兩漢、三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數代著名碑刻共五十種（碑目七十五種，二十五種未刻），用當時流行的雙鉤摹刻法彙行。從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年）開雕，迄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年）陸續完成，歷時四十載。

《望堂金石》在彙刻過程中，由於採用隨搜隨刻、隨刻隨印、隨印隨售作法，因而使得這部著作版本狀況及書名、冊數時有變化。故國內各圖書館對此書之著錄也多有不同，計有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、《激素飛清閣摹刻金石文字》、《激素飛清閣摹刻古碑》、《激素飛清閣藏碑》、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續集、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二集等不同名目之別，以及六、八、九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七等不同冊數之分。北京圖書館金石部所藏為六冊本，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部所藏為八冊本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為十三冊本、十二冊本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為十七冊本、八冊本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為八冊本、九冊本、十二冊本，北京師範學院圖書館所藏為十二冊本。經對校比較，基本搞清了本書各本之間成書先後及其異同情況。為論證方便，先將各本按彙刻早晚及其有關內容簡介如左：

北大十三冊本，著錄名「《激素飛清閣摹刻金石文字》」。此本封面貼篆文題名「《激素飛清閣藏碑》」，下注明該冊所收碑目。內封隸書題名「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」，實臣題籤。無彙刻年月。首冊首頁首行題「《激素飛清閣摹刻金石文字總目》」（以下簡稱「總目」）。「總目」版式四周黑框，框高約二十三點五釐米，闊約十四釐米，無魚尾，無頁碼，半頁九行，字數不等。此「總目」與下敘其他各本「總目」，無論是名稱，還是所收碑目，所據拓本，特別是碑目後所附「楊守敬記」，均有差異。為便於對照，今將全目抄錄於下：

《激素飛清閣摹刻金石文字總目》

△《周石鼓文》 鄧縣范氏天一閣本

△《秦琅邪臺刻石》 南昌萬氏本

△《秦泰山刻石》 福州梁氏本

△《壇山刻石》 舊拓本

△《漢熹平石經》 錢塘黃氏本金匱錢氏本

△《漢元儒先生婁壽碑》 無錫華氏本

△《漢酸棗令劉熊碑》 歙縣巴俊堂本

未刻

△《漢冀州從事張表碑》 臨川李氏本

△《漢冀州刺史王純碑》 臨川李氏本

△《漢西嶽華山廟碑》 長垣本

△《漢陳德碑》 諸城劉氏本

△《漢淳于長夏承碑》 無錫華氏本

△《漢征西大將軍楊瑾殘碑》 南海吳氏本

《漢戚伯著碑》 陽湖孫氏本

△《漢司徒殘碑》 錢塘黃氏本

△《漢殘碑額》四種 臨川李氏本

△《吳天發神識碑》 舊拓本

△《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》 元和顧氏本

△《隋丁道護啟法寺碑》 南海吳氏本

《唐孔子廟堂碑》 大興翁氏本

△《唐九成宮醴泉銘》 無錫秦氏本

△《唐化度寺邕禪師碑》 宋拓范氏書樓原本

△《唐溫彥博碑》 金壇王氏本

《唐孟法師碑》 南海吳氏本

《唐郎官石柱記》 南海伍氏本

《唐麻姑仙壇記》 道州何氏本

《日本題名殘碑》 漢陽葉氏本

△《聽松》二篆文 舊拓本

右雙鉤古碑二十餘種，宜都楊氏之所撫刻也。金石家言：嘗病洪氏《隸釋》以今所存原碑校之多不合。良由展轉翻刻，致斯謬誤。假使

景伯當日用雙鉤之法，今日之寶洪氏書者當更何如？自洪氏至今日，碑之存者十不得三四，更數十百年後，必尤多亡闕。因念見存漢碑不過數十種，即全撫之，所費亦不甚鉅，將來因罕見珍，始知此事非過舉。顧蓄此志以告人，無應之者。而余之力又不及此，乃先以碑之不存者或

未刻

未刻

未刻

未刻

未刻

未刻

最舊拓本付之梓人，六朝、唐碑則以有名之迹附焉。自同治庚午迄光緒丙子，共得斯數。此外，祕本尚祈好事君子郵寄，余不憚竭力續刻焉。七月三日，守敬記。

按此「總目」所列共有碑名三十一種，其中七種標有「未刻」二字，故實收應祇二十四種，但實際所收却有二十五種（見上抄「總目」中打「△」者，《漢殘碑額》作四種計數）。而在這二十五種碑中，《石鼓文》、《西嶽華山廟碑》、《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》及《丁道護敕法寺碑》，雖均注明「未刻」，但書中實已錄入，相反，「總目」中未注明「未刻」之《戚伯著碑》、《孔子廟堂碑》和《日本題名殘碑》，而此本竟未收錄。《孔子廟堂碑》刻於同治九年，《戚伯著碑》、《日本題名殘碑》皆刻於同治十年，是楊守敬最早刻成的雙鉤本中的三種，按理應收入《望堂金石》，此本何以未見，一時無法遽下結論。但以「總目」為據，這是一種單獨的本子當無問題。

在此本現收的二十五種碑中，十五種有刻時間，其中以《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》及《丁道護敕法寺碑》刻於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年）十二月之時間為最晚。十四種附有跋文的碑中則以《西嶽華山廟碑》楊守敬光緒三年二月之記為最後。值得注意的是：此本《秦泰山刻石》未附任何跋文，而其他各本此刻石後均附有黃士瀚光緒三年三月之跋語。「黃跋」與「楊跋」寫成的時間僅相隔一月，而此本竟未收黃氏之跋，當是書成之時，「黃跋」尚未寫就之故。

還有，此本「總目」後附「楊守敬記」寫於光緒二年七月三日，而其他各本「總目」後之楊記則寫於光緒三年二月二十六日。二記不僅時間不同，內容也有增改，且摹刻古碑數已從二十餘種增至五十餘種。

北師大十七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。此本封面、內封題名同十三冊本，無刻年月。「總目」為另一版式（見本書圖版部分）。此後六、八、九、十二各冊「總目」均為此版式，但個別地方有剝改。

此本收碑三十二種，較十三冊本多《破張郃銘》、《戚伯著碑》、《大將軍曹真碑》、《孔子廟堂碑》、《日本題名殘碑》、《郎官石記序》和《麻姑仙壇記》七種。其中《麻姑仙壇記》「總目」標明「未刻」，而書中却收有此碑。出現這種歧異，說明《麻姑仙壇記》是在「總目」刻成後才增入，又來不及剝去「未刻」二字所致。

另外，此本《壇山刻石》、《泰山刻石》及《天璽紀功碑》三碑鉤本後分別增入了黃士琳、黃士瀚、曹廷杰跋記。這表明《望堂金石》在彙印中，存在着隨印隨補的現象。

不過自此本起，《望堂金石文字》（即後來的《望堂金石》初集）所收碑數就一直固定在三十二種這一數目上。估計此十七冊本當是以後六、八、九、十二冊本《望堂金石文字》之源頭，而上述十三冊本或是楊守敬出版《望堂金石文字》之最初試行本。

關於十七冊本成書時間，可從下列事實推知：此本「總目」後「楊守敬記」寫於光緒三年二月二十六日，此本新增入之七種碑中，以《麻姑仙壇記》刻成的時間最晚，為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年）。這年，乃是《望堂金石文字》所收三十二種碑彙成時間的下限，自此以後，再刻成之

碑均收入《望堂金石》二集。因此，光緒四年可以說是《望堂金石文字》最後定型時期，此十七冊本成書也必就在這一年。

北大十二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。藍色紙封面（其他各本封面均為黃褐色），無題名。每冊書根處題《望堂金石文字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……（十二）等字。內封面名同十三冊本，無篆刻年月。書中每頁均中夾襯紙，裝訂均較他本精美。「總目」《麻姑仙壇記》下「未刻」二字剝去，剝痕明顯。

此本收碑二十七種，較十七冊本少《許長史舊館壇碑》、《丁道護啓法寺碑》、《孔子廟堂碑》、《郎官石記序》、《麻姑仙壇記》五種。初步判斷，這是一部經過重新裝訂的殘本，主要理由有三：

其一，此本所未收之五種碑當時都已刻成，早於此本的十七冊本及晚於此本的六、八、九、十二冊各本均將此五碑收錄書中，而此本何以不收呢？尤其應該指出的是，在此本「總目」中首次將《麻姑仙壇記》下「未刻」二字剝去，這說明楊守敬已注意到十七冊本中尚存「未刻」字樣以致與實際收碑情況不符之疏忽，因而在此本中剝去此二字。既然如此，那麼《麻姑仙壇記》收入此本理應不容置疑，可是事實又恰恰相反，又出現了「總目」雖剝去「未刻」而書中却不見此碑的不符現象。

其次，書中碑刻順序顯然經過重新裝訂。如：《慧山寺石牀題字》，其他各本都在《泰山刻石》或《琅邪臺刻石》後，位置偏前，一般在第一冊或第二冊中就已出現，而此本却置於《征西大將軍楊瑾殘碑》之後，收在第七冊。又如《天璽紀功碑》，鈎本有五十七頁之多，是《望堂金石》所收碑刻中篇幅最長的一種，因此其他各本或將此碑單訂成一冊，或與篇幅較短之碑刻合訂成一冊，而此本却將此碑分訂成二冊，獨與他本不同。

第三，以藍色紙作為封面和每頁夾有襯紙之作法，明顯與楊氏觀海堂通常印書成規不同，觀海堂彙行之書封面一般均為黃褐色，頁中不夾襯紙。此點庶可作為此本係經過他人重新裝訂之一明證。

此本雖是一部經過重新裝訂的殘本，但仍可看出這是另一種單獨的本子，其主要特徵有兩個：

一、「總目」《麻姑仙壇記》下「未刻」二字雖剝去，但明顯有殘痕；而此後各種本子此處殘痕業經修理，已很難看出有剝改之迹。

二、此本《石鼓文》楊氏光緒三年一月記後新增了一篇光緒戊寅（四年）冬月「守敬再記」之跋，以後各本也都有此跋。這不僅可以看出此本與十七冊本前後相承之關係，同時也為確定此本成書時間提供了依據。

北圖金石部六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。此本封面楷書貼簽「《望堂金石》」，下為該冊所收主要碑目。內封面名同十三冊本，無篆刻年月。

此本收碑三十二種，碑目同前十七冊本。該本與前後各本的主要區別有三點：一是封面題名有別於以前各本。二是「總目」《麻姑仙壇記》下「未刻」二字剝處已經脩補，了無殘痕。三是《司徒殘碑》鈎本前《漢司徒殘碑》之題名及「同治癸酉飛清閣彙」之牌記，至此本尚存，以

後各本均無。可見這應是單獨的一種本子。

北圖普通古籍部八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。此本前六冊封面題名同上六冊本。內封題名同十三冊本，無癸刻年月。第七、八冊封面墨筆題《望堂金石》二集六字，不知何人所書。內封無題名及目錄。

書中前六冊收碑三十二種，碑目同十七冊本。第七、八兩冊收碑七種，按原書順序計有《孟法師碑》、《東海廟殘碑》、《日本道澄寺鐘銘》、《日本銅燈臺銘》、《日本佛足迹碑》、《雲麾將軍李秀碑》及《法華寺碑》。這七種碑都是首次癸印。其中《東海廟殘碑》、《孟法師碑》、《雲麾將軍李秀碑》均屬「總目」中標明「未刻」之碑，而此次癸印却又未按「總目」所列順序編入前六冊，而是與新出的四種碑合編成後二冊。

在上述新增的七種碑中，《孟法師碑》癸刻於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四月，《雲麾將軍李秀碑》和《法華寺碑》均刻於光緒二十二年年初。其餘四種碑此本未署癸刻年月，但據北師院藏十二冊本所增楊守敬三女婿黃志孚補署的題名及牌記，時間均為光緒二十二年四月。可是緊接這四種碑之後刻成於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之《崔敬邕墓志》，此本沒有編入。據此，可說明該本成書時間應在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之前。

北師大八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續集。此本係楊氏觀海堂癸《鄰蘇園金石叢書》之一種。原書封面無題名，內封題名同十三冊本，無癸刻年月。前六冊書根處題《望堂金石》初集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……（六）等字，後二冊題名《望堂金石》續集（七）、（八）等字。「續集」內封無題名，但第八冊首頁有《望堂金石》二集目錄八字。「初集」、「續集」、「二集」之名，從此本開始正式出現。

「初集」六冊收碑三十二種，碑目同十七冊本。不同一點是：此本《天璽紀功碑》後曹廷杰跋缺，以下各本同此。

「續集」七、八兩冊收碑九種，較北圖八冊本多《崔敬邕墓志》、《懷仁聖教序》二種。根據牌記，知《懷仁聖教序》癸刻於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春。這個時間在各本二集所收碑刻中是最早的，因此《望堂金石》二集癸刻的起點應是《懷仁聖教序》。

科圖八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二集。此本封面及內封等形制均同前北師大八冊本，唯一不同處是此本二集「無碑目」。

「初集」六冊收碑三十二種，碑目同十七冊本。此本《婁壽碑》鈎本前原《漢婁壽碑》題名及「同治癸酉激素飛清閣校癸」牌記缺。

「二集」七、八兩冊收碑十種，較北師大八冊本多《姚恭公墓志》一種。

按《姚恭公墓志》癸刻於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年），已收入此本，而光緒三十三年刻成之《道因法師碑》未收入此本，據此可大致看出此本成書之時間。

科圖九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二集。此本前六冊封面題《望堂金石》初集，內封題名同十三冊本，無癸刻年月。後三冊封面題《望堂金石》二集，內封無題名，無目錄。

「初集」收碑三十二種，碑目同十七冊本。此本《石鼓文》鈎本後所附「守敬再記」之跋文被剝去，寅冬月守敬再記七字。

「二集」收碑十二種，較科圖八冊本多《道因法師碑》、《丁道護散法寺碑》二種。若將其中《丁道護散法寺碑》與「初集」所收該碑鈎本兩相

對照，不但版式互不相同，甚而鈎本字數及漫漶處也有差異。而且「二集」所收鈎本無題名、牌記及任何跋文。

科圖十二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文字》。此本封面無題名，內封題名同十三冊本，無榮刻年月。無「二集」題名及目錄。此本「總目」《崔敬邕墓志》、《姚恭公墓志》、《孟法師碑》、《雲麾將軍李秀碑》下原有的「未刻」二字均被剝去，這表明楊守敬已注意到這幾種碑在前四種「二集」本子中業已先後出現而「總目」中仍有「未刻」二字之不符現象。但奇怪的是：《東海廟殘碑》雖屬最早收入「二集」之碑，但「未刻」二字却仍保留（北京師院十二冊本同），這是不該出現的疏忽。

另外，此本尚有一點有別於其他各本，就是所收碑刻不分「初集」、「二集」，有些碑刻編排順序也與他本不同。

不過盡管如此，但其他各本「初集」所收的三十二種碑刻，此本也都收入。應入「二集」之碑尚比科圖九冊本多《王宏範碑》及《新羅真鑒禪師碑》二種。由於此二碑均刻於宣統元年，而刻成於宣統二年之《韓勅脩禮器碑》、《廣武將軍碑》及《李思訓碑》此本又均未收錄，故據此推斷，此本成書於宣統元年當無問題。

北京師院十二冊本，著錄名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二集。此本前六冊封面楷書題名《望堂金石》初集，內封題名同。後六冊封面楷書題名《望堂金石》二集，內封題名同，有目錄。「初集」、「二集」牌記均為「宜都楊氏飛清閣榮」，無具體榮刻年月。「總目」《新羅真興王定界碑》下「未刻」二字剝去，但書中不收此碑鈎本。

「初集」六冊，收碑三十二種，碑目同十七冊本。不同的是，此本《石鼓文》鈎本後「守敬再記」之跋文較之前科圖九冊本缺字更多，共缺「阮本尚存又歸寅冬月守敬再記」十三字。此外，《婁壽碑》鈎本前，新增「《元儒先生婁壽碑》題名及「光緒丁丑榮於飛清閣」之牌記。

「二集」六冊，收碑十八種，較科圖十二冊本多出《韓勅脩禮器碑》、《廣武將軍碑》、《鄭文公碑》及《李思訓碑》四種。其中《鄭文公碑》實即光緒七年楊守敬榮行於日本之《熒陽鄭氏碑》中《鄭義下碑》。其餘三種均榮刻於宣統二年。至此，《望堂金石》「二集」定型，與《望堂金石》「初集」構成該書最完整的一種本子。其成書時間當在宣統二年。

如上所述，可以看出此書在榮印過程中所經歷的兩個時期，即《望堂金石文字》時期和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二集時期。

在《望堂金石文字》時期，包括上述北大十三冊本、北師大十七冊本、北大十二冊本、北圖金石部六冊本四種本子。時間從同治九年至光緒四年。所收之碑始自《孔子廟堂碑》，止於《麻姑仙壇記》，由楊守敬精選陸續刻成雙鈎本碑刻三十二種。從數量上講，佔《望堂金石》所收全部碑數的近五分之四，構成了《望堂金石》全書的主體。

《望堂金石》初集、二集時期，包括上述北圖普通古籍部八冊本、北師大八冊本、科圖八冊本、科圖九冊本、科圖十二冊本及北京師院十二冊本六種本子。這六種本子的「初集」承襲了《望堂金石文字》，唯個別跋語文字微有出入。「二集」則從光緒十六年至宣統二年陸續刻碑十八種，各種本子所收碑數又互有差異，其中以北京師院十二冊本最為完備。

《望堂金石》一書之價值，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：

一、這是當時一部收錄歷代碑刻最多的雙鉤摹刻匯編。所收的五十種碑刻大都是歷代碑刻中之代表作，如《石鼓文》、《西嶽華山廟碑》、《孔子廟堂碑》自不待言，就是像《天璽紀功碑》、《許長史舊館壇碑》、《慧山寺石牀題字》等，也都是各具特色，或開一代之風氣，或承前啓後，可爲後世宗法。雙鉤摹刻之法興盛於清乾嘉年間，倡導者以黃易、翁方綱、桂馥等最爲著名。黃易曾將其家藏珍稀漢、魏諸碑拓本雙鉤摹刻，編成《小蓬萊閣金石文字》五冊，但僅收錄《石經殘碑》、《范氏碑》等碑刻十一種，即爲時人所推重。翁方綱、桂馥雖重視此法，但二人均無專書問世。道光間，上海徐渭仁輯成《隨軒金石文字》，僅收雙鉤本九種，數量更少。楊守敬《望堂金石》承繼在後，並將這一形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。《望堂金石》之後，隨着攝影翻印技術的產生和普及，雙鉤摹刻法由於難以與之抗衡，而被放棄。但《望堂金石》之功不可磨滅，因爲它不僅是雙鉤摹刻法所能達到的最高階段，同時也是具有歷史價值的最後階段。

二、《望堂金石》收碑既多，而且大多數雙鉤本後還附有楊守敬本人或其他許多學者的跋記。據統計，在此書所收五十種碑刻中有三十四種有跋，總共五十六篇。有的碑且不止一跋，如《元儒先生婁壽碑》就附錄有豐坊、翁方綱、馮敏昌、章美、葉志詵五篇跋，可謂博采衆家之說。但是楊守敬又絕不拘泥於他人觀點，而且對名氣很大人物之論斷也勇於提出不同看法。如在《法華寺碑》跋中，他一方面稱贊何紹基對《法華寺碑》「考證詳密，足訂俗本之謬」，另一方面也對何氏斷言顏真卿、李邕之書法「淵源河北」、而不「依傍山陰」之說法給與辯駁。楊守敬認爲：任何想在書法上有成就的人都要有獨創性，「依人門戶不自立，面目安能籠括一代？」只有「智過其師，方堪傳授」。顏真卿、李邕正是由於博采衆長，所以才能「歷劫不磨」，獨豎一幟。這種求實、進取、創新的精神，是楊守敬治學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，同時也是他學術思想中最可寶貴的財富。

三、楊守敬在金石學、史學、歷史地理學等多方面學術造詣均很高，使他在開展研究中，往往能以史證金石，或以金石證史，取得很大成績。這樣的例子，在《望堂金石》中很是不少。例如在《大將軍曹真碑》跋中，楊守敬首先引用《三國志·魏書·曹真傳》之記載，證明碑中幾處文字信而有徵，其次又依據碑文記載，論證當曹真、張郃等率軍攻打鎮守江陵之吳將朱然時，而鎮守宜都的陸遜不去解圍，其原因主要是「備西蜀故也」。類似這種利用金石、地理資料以補充或糾正史書記載之研究方法，是楊守敬治學上又一個突出特點。

四、《望堂金石》不僅精選了國內的四十五種碑刻，而且還收入了《日本題名殘碑》、《日本佛足迹碑》、《日本道澄寺鐘銘》、《日本銅燈臺銘》及《高麗真鑒禪師碑》等五種國外碑銘。另外，「總目」中還列有一種未刻的《新羅真興王定界碑》。這些碑銘在我國國內金石學有關著作中，大都缺乏著錄，即如綜錄了一百三十七種金石著作之多的《石刻題跋索引》也僅載《真鑒禪師碑》一種，其他可以想見。而將這五種國外珍品全部雙鉤摹刻介紹給國人者，當數《望堂金石》一書。

楊守敬收入這些碑銘，確實具有敏銳的大師眼光，因他不僅看到了這些碑銘本身的真實學術價值，而且還從國際文化交流角度看到了

與中國金石學的淵源關係。如在跋日人西田直養著《日本金石年表》中，楊守敬這樣評價上述的幾種日本碑銘，說：「日本所存千年以上墨蹟，所見以數千計，金石刻則無甚古者。然金如《神護寺鐘銘》、《南圓堂燈臺銘》、《道澄寺鐘銘》；石如《多胡郡碑》、《佛足迹碑》、又未嘗不精妙可喜也。」在《學書通言》中，楊守敬也評價道：「其金刻有《道澄寺鐘銘》、《銅燈臺銘》；石刻有《和銅題名》，最爲高古，神似顏魯公。」文中提到的《多胡郡碑》、《和銅題名》就是《日本題名殘碑》、《南圓堂燈臺銘》即爲《日本銅燈臺銘》。對《真鑒禪師碑》，也曾專門爲之作跋予以評介。楊守敬去過日本，當他在日本期間，曾利用當時剛剛興起的照相翻印技術縮印成《寰宇貞石圖》，回國後又利用在日本搜集的資料著成《日本訪書志》，二書的完成，亦可證明楊守敬對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視與卓識。

當然，也應指出，《望堂金石》也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，除上面介紹各種本子時所涉及的某些問題外，這裏再舉兩例：如《定武蘭亭》及《王居士磚塔銘》書中不收，而「總目」中所列此二碑目下無「未刻」二字。《新羅真興王定界碑》，其他各本「總目」中此碑下均有「未刻」二字，獨北京師院十二冊本將「未刻」剝去，但書中仍未收錄此碑。雖然如此，但終是瑕不掩瑜，不會影響此書在金石學上的重要價值。

這次整理《望堂金石》，是以北京師院十二冊本「初集」、「二集」爲底本，此本原殘缺處，如《石鼓文》後「守敬再記」之跋，《司徒殘碑》前之題名及牌記，《天璽紀功碑》後曹廷杰之跋等，均依北圖金石部六冊本換補。全書全部照相製版。在整理過程中，主要所作工作如下：

首先，新編《望堂金石》總目，附於「前言」之後，以便與原「總目」對照。

其次，將書中所有跋語均依照片原文錄出，進行標點、分段。其中楊守敬本人跋語中所出現之引文，皆逐條與所引原書覈校，訛誤之點出注說明。跋中所涉及之史實、書籍、人物等，也盡可能地查出，有必要者，亦加注釋。至於其他學者之題跋，除出現明顯訛誤須注釋外，一般概不出注。

還有，爲了使讀者省翻檢之勞，對書中所收各碑都有一段簡要介紹，列爲每碑的第一條注釋。

最後，爲了便于讀者對照查閱，在新編「總目」、圖版及文字部分每種碑名上方，均分別相應標以同樣的阿剌伯數字順序號。

本書之整理，起初由北京圖書館金石部賈雙喜、冀亞平二同志承擔，後因他們工作繁忙，難以投入更大精力，方由我接力續成。無疑，本書之完成，是我們三人共同勞動的成果。

郝志羣

一九九二年元月六日於北京